

十字軍東征

扎波羅夫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十字軍東征

扎波羅夫著

哲安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九年·北京

М. А. Заборов
КРЕСТОВЫЕ ПОХОД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6
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版译出

十字軍东征

[苏]扎波罗夫著
哲安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書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張8 $\frac{1}{2}$ ·插頁3·字數172,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11002·271 定价(六)1.05元

目 次

引言.....	1
第一章 十字軍东征的原因和准备.....	5
第二章 第一次十字軍东征.....	48
第三章 12世紀的几次十字軍东征.....	125
第四章 第四次十字軍东征.....	170
第五章 最后的几次十字軍东征.....	232
結論.....	256

引 言

十字軍东征……很多人一看到这个書名，可能記起华脱·司各脱的長篇小說“巴黎伯爵罗柏特”和“爱凡荷”中引人入胜的几段。在有些人的記憶中，則可能記起历史教科書中比較枯燥、但是更为符合史实的中世紀西方騎士为爭夺耶路撒冷与“不信者”作战的故事。但是大多数讀者拿起本書时最先想到的，大概是：十字軍东征事件已經距現在好几百年，那些發生在这么久以前、而且又是在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封建战争，与我們建設共产主义的苏联人有什么相干？再写十字軍东征的历史作什么？

不錯，由羅馬天主教会煽动起来的法、德、意、英和其他封建主的十字軍东征，的确是早已过去的旧事了。

然而，第一，研究它們很有科学意义。11—13世紀原是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历史中充滿極重要事件的时代。那是封建制度，即所謂“古典中世紀”最充分發展的时代，因此对于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來說，十字軍东征在这一时期的中世紀社会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决不是无足輕重的。确定十字軍运动的客观内容和真实性質，闡明它的社会經濟根源，探索出天主教会在这运动中的作用，判定十字軍东征对当时社会政治空气的影响——解决了这种种問題，才能对11—13世紀这一时代的許多事情有正确理解。研究十字

軍東征給人以豐富的資料，使他們對中世紀最重要的特征作出最完整精確的科學概觀。

再則，遺憾的是，這些早已過去的事件，在今日有了明目張膽的支持者和辯護人。11—13世紀的“神聖戰爭”，近幾十年來竟吸引着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政客和思想家的非常重視，他們力圖以略加改裝的新形式，復活那些曾由羅馬教廷用以煽動那批為掠奪土地財物奔赴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埃及和君士坦丁堡的中世紀騎士侵略者的觀念和口號。這種傾向在“冷戰”時期大為流行，這時候“十字軍東征”這一口號成了軍事帝國主義者的宣傳工具之一。他們儼然以基督教保衛者自居，以“基督教信仰和倫理道德的拯救者”自命，說他們是受了“無神論的共產主義”的種種威脅。

現代資本主義的思想保衛者向中世紀尋求欺騙人民的方法，是極有意義的事情，因為這証明了在日益強大鞏固的無產階級面前恐懼戰慄的統治階級，攀住一切陳舊、垂死、中世紀的東西，“與一切衰敗了的和正在衰敗的勢力”聯合起來，“以求保存陷於動搖狀態的僱傭奴隸制”^①。而盡最大努力始終想把埋葬於歷史中已達幾百年之久的“十字軍東征”觀念借尸還魂者，是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岡。受羅馬天主教會首腦支持和祝福的“冷戰”擁護者，使用了借自納粹匪徒思想武庫的工具，其中包括“十字軍東征”這一口號在內。關於這一點，出席討論保障歐洲和平和安全的歐洲國家會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代表團團長，在1954年11月30日發言中曾經談到^②。對於“從實力地位出發的”政策

①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82頁。

② “新時代”，1954年，第49號。文件附錄，第25頁。

拥护者所进行的这一宣傳的特点，全世界保衛和平运动的领导人早已促使各国人民注意。例如約里奧·居里在維也納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2年12月12日）的開幕詞中，指出帝国主义宣傳的企圖：“造成一种十字軍东征的空气，煽动居民的狂热，訓練他們投入最可怕的战争。”^① 在法国全国和平大会最后一天會議（1955年4月4日）的發言中^②，約里奧·居里在揭露和平敌人原子訛詐的危險时，指出反动势力想“發动原子战争作为十字軍东征，以消灭与他們性質不同的制度”；他們否認“不同制度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力圖“發展十字軍东征观念”，来对付他們所不喜欢的制度。

利用十字軍东征这一口号的意圖，不但見于資本主义世界各种政客的口头和書面声明，見于梵蒂岡在“冷战”高潮中进行的宣傳，反对“无神的共产主义”的十字軍东征观念，也由現代資產階級历史科学在傳布。当然，这不是堂而皇之而是乔装改扮的。战后年代許多号称“客觀”地研究闡述十字軍东征史的書籍文章（而且同声強調作者的意圖純粹是“啓蒙的”），尽情贊揚中世紀騎士的盜匪行为。美、英、法的历史学家中有不少为封建掠夺者和殖民者辯护，为組織11—13世紀十字軍东征的天主教会的活动粉飾，借此为那些反对民主和社会主义陣营的“十字軍东征”的公开宣傳者开路。

壟断資本的思想奴僕們的这一切宣傳活动，在过去对和平事业有一定的危險性，而在相当条件之下，也会更进一

① “真理报”，1952年12月13日。]

② “真理报”，1955年4月7日。]

步危害和平。这在有些资产阶级的政论家也承认如此。例如1955年9月的美国“民族”周刊，就刊载过累克罗斯的一篇文章，形容若干现代学者的歪曲十字军东征史是“危险的”：据他说来，这种歪曲“迷惑了政治家和军事家”^①，换句话说，是为反动和侵略势力的政治利益服务。

因此，夺下那些仍想欺骗人民的家伙们手中的散布谎言毒素的害人武器，是愈来愈重要了。为此也就应该了解反对和平共处者昨日还在号召复活其精神的十字军东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西方说是为崇高的宗教理想进行的十字军东征，是不是敬神的行动？十字军东征是不是所谓“神圣战争”、“武装朝圣”？它们唯一的主要的动机是不是宗教？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有科学根据的答复，有助于判明今日和平的歇斯底里敌人的十字军号召，其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本书作者的任务之一即在于此。作者之意不在于完全无遗地阐明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史。他的目的只在于叙述这几次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从而帮助读者了解它们的真正历史。

① 累克罗斯：“反基督教的十字军”，载“民族”周刊，1955年9月10日，第226页。

第一章

十字軍东征的原因和准备

关于十字軍东征原因的問題，早已引起历史学界注意。上世紀和本世紀的历史学家，提出了种种解說，說明为什么大批欧洲人在历时几达二世紀之久的期間（十字軍起于1096年終于1270年，虽然是断断续續的），紛紛响应天主教号召，向征服我們現在称为近东的各国出發。

在19世紀初期出版的历史著述的作者如維尔坎和迈克尔，因受天主教会傳統的影响甚深，認為十字軍是中世紀西方人民深厚的宗教精神的表現。据这些历史学家的意見，十字軍之所以兴起，是在于西欧人民激于宗教热情，衷心要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有着所謂“聖陵”的耶路撒冷，以及在巴勒斯坦的其他“聖地”，这些“聖地”据說是耶穌基督的出生之地，有的則据“聖經”記載，是这个神話中的基督教創始者度过人間生活的地方。

后来随着历史学的發展，随着种种新史实的發現，对于中世紀历史文献改取了比較不是盲目接受的批判态度，大多数历史学家抛弃了那种天真幼稚、显然是唯心主义的关于十字軍起因的敘述。19世紀后半期和20世紀初的学者，更深入研究了他們搜集的大量的文件資料，注意到11—13世紀刺激十字軍运动兴起的社会經濟生活的种种影响：西

歐人民群众的困苦处境(普魯茲、佛尔夫)、参加十字軍东征的北部意大利各城市的商业利益(該德)。据許多历史学家(布賴、斯提文松、諾登等等)的意見，促使羅馬教廷組織十字軍东征的动机乃是政治：力圖在与德皇的斗争中提高威信，力謀希腊正教会与羅馬教会的复合。

有些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力圖现实地探討問題，提出了个别正确的关于十字軍起因的論旨，立下了中肯的事实上确为十字軍运动根本原因的各种现实的經濟和社会政治因素的推論。許多法国历史学家(里安、得·瓦伊、布賴、琉西尔、夏兰同)、德国历史学家(席培尔、普魯茲、庫勒尔、佛尔夫)、奥国历史学家(勒利赫特)、俄国历史学家(瓦西里耶夫斯基、烏斯迈斯基、米特罗發諾夫、耶哥罗夫)及其他史学家的著作就富于这种有价值的观察。

然而整个說来，資產階級的历史科学即使在它最良好的發展时期，对于十字軍东征的复杂的起因問題，也不能給以令人滿意而全面的解决。这是由于支配着历史学家的唯心观点作祟。实际上研究十字軍东征的学者，从未完全抛弃关于十字軍东征的这一天真幼稚的概念，就是認為十字軍是两种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斗争，德国历史学家席培尔所說的“十字和新月”的斗争。

至于現代資產階級历史学家的著作，他們之中虽有一部分繼續前輩研究家的现实主义的傳統，但許多人在其关于十字軍运动起因的討論中，公然倒退到連資產階級科学也不能接受的始于上世紀初的陈腐观点。这些学者中的一批人有时从宗教的蒙昧立場出發，固執着討好梵蒂岡的理論。成了唯心主义俘虏的現代历史学家，在企圖說明十字

軍东征的原因时，大多数束手无策。他們只是重复着什么支配11世紀的西欧好象是由教会改革产生的“宗教热忱”，什么在这个宗教热忱的环境中获得傳播的“神聖战争”的观念等等①。

例如据勒·菲符勒說来，十字軍东征的唯一目的是为基督教的胜利而战；它們只解决一个問題——是基督教的世界还是伊斯兰教的世界：是由聖經还是由可兰經来規定世界的風俗制度②。这种解說当然不能令人滿意。有些現代历史学家实际上无力說明十字軍东征的原因，只会以冷嘲来否定資產階級旧史学家对这个問題看法中的唯物主义因素③。总之，說十字軍东征的原因完全在于时代的思想气氛的观念，支配着現代西欧研究家的著作④。

遵循馬克思列宁历史唯物主义学說的苏联历史科学，指出了真正科学地說明十字軍东征原因問題的正确道路。

这問題的許多重要方面，已經由E·A·科斯明斯基、H·П·格拉茲安斯基、B·B·斯托克利茲卡雅—帖烈什科維奇、B·H·札霍及尔、H·A·西陀罗娃及其他苏联历

① F·L·甘受夫：“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中世紀”，巴黎1953年版，第86頁。

② 勒·菲符勒，“隱修士彼得与十字軍”，亞眠，1946年版，第31—33頁。

③ 例如理查就是这样，他嘲笑那些将第一次十字軍东征和他所謂的“經濟危机”联系起来的企圖，因为經濟危机被說成了由于采用使农民和騎士“紛紛破产”的改良馬具所致（理查：“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巴黎1953年版，第29頁）。理查在这里故意使站在所謂經濟唯物主义立場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成为笑柄。

④ 这論題就常見于П·盧塞的著作，包括他在巴黎第十届国际历史学家會議（1955年9月）的講演：“西欧編年史家的十字軍观念”。他重复他的“第一次十字軍东征的原因和特点”一書的基本論点，在

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研究。

十字军东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要明白这些原因，至少必须明了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1) 为什么西欧农民和封建主(后来是市民)从11世纪末向海外各国——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前进；

(2) 为什么这运动要打着宗教旗帜进行；

(3) 什么局势使十字军；至少是第一次十字军，向地中海东岸而不向别处进军。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观察到11世纪末的封建西欧各阶级的处境，天主教会在当时封建社会的作用，十字军东征前夕西欧、拜占庭、东方之间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

*

*

*

在西欧人民的生活中，11世纪正是经济上发生大变革的开端。那时候除了耕作上畜牧上的成就以外，羊毛、金属加工和建筑也有所成就，这就导致了手工业和农业的逐渐分工。在欧洲兴起而且发展了城市。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开始有了相当定期的商业关系；交换有了经常性。国际间的商业来往也逐步扩大，而且这不限于欧洲国家之间；这些国家与拜占庭和东方的贸易也巩固了。以前毫不重要的东方

講演中竭力强调思想动机，好像十字军运动的兴起就由于此；在引起十字军运动的种种原因之中，他把11世纪的“心理气候”“思想感情状态”等等列为第一。〔“第十届国际历史学家会议报告”（以后简称“报告”），佛罗伦萨1955年版，第3卷，第561页〕。

其他许多历史学家也有同样见解，特别是美国历史学家雷蒙·阿提亚。后者于1951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的几次講演中，认为十字军东征是“观念和理想之战”，好像中世纪人民的东征是“为宗教而战。”（阿提亚：“十字军”“旧思想与新观念”，载“世界史笔记”，巴黎1954年版，第2卷，第2号，第470页）-

貿易，这时吸引了相当众多的城市参加。很久以前阿尔(法国南部)已經与阿拉伯国家从事貿易。还在九世紀时，里昂、馬賽、亞威农等城市的商人就一年两度远往埃及的亞历山大經商。他們从亞历山大运来印度香料、阿拉伯芳香物及其他东方貨物，經水路深入法国腹地行銷。在意大利城市中，定期与东方进行貿易的有巴利。1086年，滿載水果和其他貨物的巴利商船队开往叙利亞的安提俄克。

阿馬尔非商人是埃及的常客。兼治巴勒斯坦的埃及苏丹，甚至以耶路撒冷的一区划給阿馬尔非商人居住。威尼斯商人尽力与东方作交易。在11世紀初期，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阿雷波、大馬士革、开罗——几乎都有威尼斯派来的使节。成立不久的意大利各共和国，与东方国家的貿易最为繁盛。

精明的意大利北部商人，后来积极参加了十字軍东征。他們参加的动机是謀利，是想巩固本身在东西方貿易中作为經紀人的地位，排挤在地中海东部的意大利城市的勁敌拜占庭。不过北部意大利共和国商业利益(作为十字軍东征的原因之一)的直接影响并不立即显现。热那亞、比薩、威尼斯的积极参加十字軍东征，是在十字軍运动已經产生了相当实际的结果之后。在十字軍东征初期，北部意大利市民所起的作用远不及西欧其他社会集团那么重要。

十字軍东征的原因，首先在于到11世紀發生的西欧主要社会阶级地位的变动，而这变动則起因于西欧發生的經濟变革。

西欧农民及其反对封建主压迫的斗争

在11世紀，西欧最大国家的农民几乎完全淪为农奴。有些地方的农民还保全着人身自由，但是为数不多，而且也不是完全自由，因为他們为了使用耕地，必須向主人繳納种种租費。农奴要服徭役(每周多至3天)，还担負其他名目繁多的劳役。他們用实物——农产品——向封建主繳納的有地租、人头稅、使用森林或草地費，領主出征时的养兵費用也要由他們負担。还有象征农奴人身依附的种种特别义务；例如按照“死手”法，已死农民的財產应交領主，如果死者的繼承人想保有这份財產，必須賄賂主人，獻給他最好的牲畜，最好的衣服。封建主家里有喜庆(結婚、長子成年等等)的时候，又要向农民額外勒索。此外还要繳納种种法庭費、桥梁費和市場費以及諸如此类的賦稅給占有土地的領主。同时还有强迫农民繳付教会的“什一稅”，而且实际上常常超过农民收入的十分之一。

到城市出現，商业随之而發展，农民的生活变得更苦。現在領主不再只滿足于农民供奉的面粉、油、蛋、肉、漿果了。封建主的胃口愈來愈大。他們要購買城市手工业者制作的物品如武器、衣、鞋、甲冑，它們的質地比乡下匠人制作的优良；他們也漸漸爱好由意大利商人供应的海外物品：織物、酒、裝飾品、家用杂物。領主生活用品的种类愈來愈多。因此領主的需索也愈來愈甚：他們年年增加种种名目的橫征暴斂。在11世紀，有些地方已經征收使农民困苦万分的貨幣租稅；封建主需要貨幣。例如根据洛林的迈克尔修道院的一件文書(11世紀的)，我們知道有一位雷諾尔德伯爵为

了向修道院的农民征取貨幣捐稅(貢稅)，“投我們的(修道院的)人于牢獄，以拷打勒索財物。”文書中还提到这位伯爵以冷嘲口吻宣称自己的暴虐“并不依法而行”。11世紀和12世紀的許多文件，使我們清楚知道世俗和教会的領主怎样惨无人道地压迫农民，勒索層出不穷的苛捐杂稅。

但是使农民喘不过气来的不仅是封建主勒索的苛捐杂稅。11世紀西欧遍地發生的頻繁战争，与农民的陷于貧困大有关系。那是封建割据盛行的时代。法国的大小領主彼此仇視。封建主的紛爭使德国陷于四分五裂，那些卷入皇帝与教皇之間爭奪封地授爵权斗争漩涡的各封建集团兵戎相見。封建“党派”之間的殘酷內战也發生于意大利和其他国家。

最先受封建主不断战争之害的是农民。在战争中，領主毫不爱惜农民的庄稼。农民的一些薄产被搶劫一光，因而变得赤貧。他們的家屋被焚毀，积谷常常化为灰烬。編年史作者奧得利克·維泰利斯紀述11世紀末叶諾尔曼貴族之間的紛爭道：“他們的穷兵黷武，騷扰得农民和和平的市民无法安居。”修道院的文書記載着因封建主內乱而造成的田园荒廢十室九空的惨状。一件1050年的文書記着：“时常發生战争的結果，这地方(圖朗——著者)变成了荒野，差不多有八年之久人烟絕迹。”在1062年的一件文書里，又記着：“土地(在安茹——著者)荒廢，无人耕种。”

这样，封建的混乱使农民群众的处境大为困苦。受尽封建压迫的农奴及其家人，迫得天天过半飢半飽的生活。

我們还必须注意到被奴役农民的劳动，生产量極少。尽管在耕作上有了一些改进，农业技术还是簡陋得很：耕地多靠人力，用鋤和鍬；当时已經采用重木犁耘土，但是拖犁的

役畜不足；常用乳牛耕地，有时候甚至使用山羊。土地極少施肥，而且施得不好。土壤的肥力几乎不能恢复，迅速耗尽。

11世紀欧洲各国之岁岁飢饉，是不足为奇的。有些学者用据说發生于当时的气候变化反常來說明飢饉，也就是想把农民的貧困归罪于当时的天灾。若干地方的天灾如干旱、冰雹、雨水过多，当然使农村生活遭殃，11世紀編年史作者的不断記述这些自然灾害，不是毫无原因。然而天灾之所以特別为害，却由于农业技术的低下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制度使然。

11世紀飢饉有多么悲惨，飢饉时常常發生的人吃人事件足以为証。柏干提的編年史作者拉杜尔夫·格拉柏留下了駭人的記載，叙述1032年發生于法国許多省份連續三年之久的大飢饉时四处流行的人吃人惨状。这位敬神的編年史作者同他的許多同时代人一样，認為飢饉的原因起于上帝对犯了“罪孽”的人类的震怒。他写道：“人大吃人。强有力者謀害过路人，把他們切成塊，用火烤熟后狼吞虎咽……在許多地方，地里掘出来的尸体也用来充飢……吃人肉已經像家常便飯，甚至于有人拿人肉煮熟了在圖尔紐斯的市場上当牛肉卖。这个人被逮捕了，他并不抵賴自己的罪行；于是把他綁起来用柴堆燒死。把肉埋在地下，但夜里又有人把它掘出来吃了。”格拉柏告訴我們的这件事情，在11世紀并不是絕无仅有的。那时代的許多編年史作者都描写飢饉年头的居民惨状。而飢饉又是連年不断。据法国历史学家得尔·得·拉·沙凡計算，11世紀有26个荒年，也就是說荒年占这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以上。到11世紀末，飢饉更成为农村的常客，西欧遭受連年飢饉——所謂“七載荒年”

(1087—1095年)。

經常的歉收和飢饉，隨之而來的瘟疫，在農民是真正的災難。飢饉還帶來使人煙絕滅的時疫。在飢饉年頭中發生的傳染病，害死了鄉村城市中成千因飢餓而身體虛弱的人民。記載1094年鼠疫的一個法國編年史作者簡略地指出：“許多村落中不見一個種田人。”據另一個當代人的記載，3個月中累根斯堡居民死于鼠疫的達8,500人。而這些災難又正在封建壓迫愈來愈厲害的時候落到農民頭上。11世紀的農民不論其已為農奴或即將淪為農奴，主要的決定性的破產原因，就是愈來愈甚的封建剝削。

領主的壓迫激起農民理所當然的反抗。反抗的表現形式各不相同。在有些地方，農民是真的揭竿而起——編年史作者所稱的“造反”。這樣的起義在11世紀發生于不列他尼、法蘭德和英國。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前不久，農民反抗封建壓迫的積極行動也發生于法國。編年史作者記載着受盡貧困和飢餓之苦的農民怎樣火燒、搶劫、破壞“富人”的財產，怎樣向那些乘人之危、放債給窮人重利盤剝、常常奪去窮人本來少得可憐的最後一點財產的人報復。哲姆布魯的編年史作者修士錫格培脫慨嘆：“窮人以搶劫和縱火收拾富人”。

在這時代，農奴的無組織的抗議，常常採取其他的即消極的方式。他們看不見脫離貧困和受壓迫苦海的出路，有的陷于完全絕望：在11世紀90年代，鄉間有集體自殺的慘事。有的想解脫封建現實的悲慘，只求逃避這個現實，哪怕是“精神上”的逃避也好。于是人民中間興起了種種特殊的宗教教義，實質上它們是反對封建秩序主張社會平等的教義。教會宣布這些教義是“異端邪說”，無情地迫害“背教者”，因